

教育史学论稿

张斌贤 著

ESSAYS ON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教育史学论稿

张斌贤 著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浙江教育出版社·杭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史学论稿 / 张斌贤著.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9.10

ISBN 978-7-5536-9259-3

I. ①教… II. ①张… III. ①教育史—国外—文集
IV. ①G5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71352 号

责任编辑 余理阳 王凤珠

责任校对 谢 瑶

美术编辑 韩 波

责任印务 陈 沁

教育史学论稿

JIAOYUSHIXUE LUNGAO

张斌贤 著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邮编: 310013)

图文制作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89 000

版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36-9259-3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联系电话:0571-85164359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自序

自1986年7月留校任教,至今已30多年。2016年以来,我用了不少时间回顾自己30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反思自己在业务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出现的失误乃至错误,分析产生这些问题和错误的主客观原因。这既是为了警示自己,以便今后少犯错误,至少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也是希望年轻一代的教育学者和学生能以我为鉴,在求学和治学的道路上更为顺畅地前行。因此,2016年以来,我先后在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为研究生做了题为“批判与自我批判——三十年教育研究之路的反思”的讲座,希望更多的青年学子能从我的经历和反思中汲取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编写本书同样是这种反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0多年来,我着力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研究工作正是关于教育史学问题的思考。本书收录了我从1986至2016年30年间先后发表的关于教育史学的部分文字(其中几篇是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这些文字从侧面反映了我30年间的所思所想,从中既可以看到我在不同阶段思考的重点,也能发现研究工作存在的问题。为真实记录这个过程,除对文字进行润色之外,没有对内容做任何修改。

我对教育史学产生兴趣纯属偶然。记得是在1985年五六月间,我在与先师王天一教授闲聊中得知,当时的全国教育史研究会计划于当年11月在西南师范大学召开年会。我猜想先生当时并没有考虑安排我参加年会,也认为这个信息对我并不重要,所以,他只是略微提及这一信息。没想到我这个毛头小子竟不知天高地厚,自作主张地开始写起了年会论文《浅谈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并很快完成。但是,这毕竟是第一次独立撰写学术论文,心里没底,所以,我

请刘传德老师把关。经过几轮修改后,我才忐忑不安地将论文呈送王先生审阅。王先生当时并未对论文本身发表意见,只是说我正在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关键时期,不宜中断论文写作去参加年会。我虽然未能赴会,但由我和刘传德老师共同署名的论文还是作为年会论文提交给大会,并由刘老师在会议上宣读,据说还曾引起一定的反响。

原以为我的习作到此就完成了使命,却不料,时任《教育研究》杂志编辑的张嗣玺先生认为文章虽然幼稚,却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他力主发表,将该文刊登于《教育研究》1986年第4期。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论文,可想而知,这对一个时年25岁的青年人是多么大的鼓励!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1986年开始,我先后在《教育研究》上发表了《再谈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与教育史学科的建设》《再论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现实感》《略谈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进展与趋势》《论教育理论研究中的“历史感”》等文,并在《教育研究与实验》发表了《关于“教育史学”的构想》一文。客观地说,这些论文对于促使教育史学界反思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教育史学日后逐渐成为教育史学科一个相对专门的研究领域,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的。

1990—2008年的近20年间,由于我主要从事教育政治学和西方教育思想史研究、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十余年的行政工作,除了间歇写过几篇论文外,基本上停止了对教育史学问题的系统研究。但是,我从未停止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2009年初,我重归书斋,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系统梳理自己的学术活动。在确定今后主要研究方向的同时,我深感有很大的必要继续教育史学的研究,所以,“重操旧业”,先后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教育学报》《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等刊物发表了《论整体教育史观》《重构教育史观:1929—2009年》《教育史研究:“学科危机”抑或“学术危机”》《教育史观:批判与重构》等论文。

回顾30多年来对教育史学问题的探讨历程,多少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些

丝毫没能消除我内心的不安和愧疚。原因在于：第一，虽然我是非常偶然地涉及教育史学问题的研究，但是，如果能较快地完成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那么，此后的研究工作是否可能会更顺利一些？第二，我出身教育学专业，而教育史学事实上主要依仗哲学和史学理论。这些年来，我也浏览了大量的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等相关领域的书籍，自认为多少有些知识积累，但是，如果能更深切地意识到这些相关学科的知识 and 理论对教育史学研究的价值，那么我对教育史学的研究至少会更加深入。第三，从以上回溯中可以看到，这些年来我对教育史学问题的涉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间歇性的，甚至可以说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的研究工作。因此，尽管我先后发表了一些论文，但研究工作是不系统的，这又从另一个方面阻碍了研究工作的深入。

我常想，如果这些错误能够避免，如果我始终能够自我反省，随时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如果在不同阶段都有人提醒我，结果或许会有很大的不同。当然，我也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我在过去 30 多年间出现的失误以及现在对这些失误的反思有什么意义呢？

诚然，这对我自己的确有意义。虽然醒悟来得晚了一些，但是，至少我还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过如果仅限于此，我也无须大费周章地做这些事情，只需提醒自己即可。在我看来，在广泛的意义上，学者个人的“学术史”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一个学科演化史的浓缩，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科变化的轨迹。对于即将开始学术生涯的年轻学者，是完全能够从每一个学者的治学历程中发现一些对自己有益的东西的。在这个意义上，年长一辈出现的失误就是为年轻一辈提供警示。这也是我编撰本书的初衷所在。

回顾 30 多年来关于教育史和教育史学研究的历程，我对许多前辈学者和同行心存感激。首先要感谢先师王天一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王先生虽然不赞成我把大量时间用于教育史学研究（他认为青年人首先应该打下扎实的教育史基础），但还是对我的固执非常宽容。至今想来，没有王先生当年的宽容，我可能早就放弃了这项工作。其次要真诚地感谢张嗣玺先生。没有他当年

的大力扶持,我很有可能走的是另一条完全不同的学术道路,至少不会在教育史学这条路上走得这么长、这么久。吴式颖先生、金锵先生、李明德先生、田正平先生等老一辈教育史学家多年来对我关爱有加,在任何时候都对我的学术工作给予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华东师范大学杜成宪教授和王保星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宁波大学贺国庆教授等同行多年来在教育史学领域辛勤耕耘,成果丰硕,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的思考大有裨益。

浙江教育出版社莫晓虹编辑为本书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 2017 级博士研究生杨帆同学、2016 级硕士研究生李昂同学为本书的后期加工与编辑中文教育史学研究论文索引付出了辛劳。在此一并感谢。

本书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与美国社会改革”(项目编号:15ZDA25)的阶段成果。

张斌贤

2019 年 3 月 28 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第一编 外国教育史研究：学术史回顾

- 第一章 略谈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 3
- 第二章 重构教育史观：1929—2009年 / 14
- 第三章 外国教育史研究：进展与评论 / 28
- 第四章 2014年外国教育史研究进展综述 / 68
- 第五章 2015年外国教育史研究进展 / 94

第二编 外国教育史研究：挑战与危机

- 第一章 浅谈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121
- 第二章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面危机中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 / 128
- 第三章 教育史研究：“学科危机”抑或“学术危机” / 138

第三编 外国教育史研究：重建之路

- 第一章 关于“教育史学”的构想 / 151
- 第二章 探寻教育史学科重建的出发点 / 156
- 第三章 历史唯物主义与教育史学科的建设 / 170
- 第四章 教育史观：批判与重构 / 182

第五章	论整体教育史观	/ 205
第六章	教育史研究的功用	/ 219
第七章	从“体系时代”转向“问题时代”： 外国教育史学科振兴 的路径	/ 231
第八章	教育思想史研究的视角与视野	/ 244
第九章	关于大学史研究的基本构想	/ 263
附 录	中文教育史学研究文献索引	/ 274

第一编

外国教育史研究：学术史回顾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第一章

略谈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外国教育史研究有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获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认真回顾这一前进的历程,分析今后的发展趋势,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是大为有益的。笔者通过研究分析,认为1978—1990年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1978—1982年的重建时期;1982—1985年的探索时期;1985—1990年的发展时期。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下面分别谈谈个人的体会,与外国教育史学界的同仁共同讨论。

一、重建时期(1978—1982年)

大家知道,由于十年动乱,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长期陷于停顿,一些错误的思想观念牢牢地束缚着教育史研究工作。因而,要发展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首要的任务必然是排除“左”的思想的影响和干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时期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导向。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重新开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在全会精神鼓舞下,外国教育史研究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思想解放的洪流之中,对外国教育史学科中各种“左”的思想观点和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建设问题,开展了深刻的批判和讨论,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认识。这为1979年12月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届年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史研究者对观点与史料的关系、教育

发展的共同规律以及教育史的研究范围等问题,展开了空前热烈的讨论。^①对这些问题进行学术探讨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在教育史界的具体反映,是为学科研究的长远发展扫清障碍。这次会议是全国教育史界的第一次盛会,它在教育史学科研究史上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是新时期教育史研究的良好开端。

从1979年的第一届年会到1982年5月的第二届年会这三年间,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学科的恢复与重建上。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具体的表征。

第一,对杜威、赫尔巴特等教育史人物的重新评价。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第一、二届年会都把对杜威等教育家的重新评价作为会议的重要议题。由于杜威与赫尔巴特是西方教育史上影响最大的教育家,也是我国教育史界存在争议最大的教育史人物,因此,对这两位教育家的重新认识不仅有助于客观、准确地理解他们的思想,而且有利于促进对所有教育史人物的合理认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对教育史人物的评价首先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因而,这种再认识是意义深远的,它涉及整个学科的全面重建。外国教育史学科后来的发展表明,正是由于以这两位教育家的重新评价为突破口,才使学科研究迅速在废墟上重建并得到长足发展。

对杜威与赫尔巴特进行重新评价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教育家的阶级立场和哲学倾向与其教育思想以及对教育发展的贡献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此之前,由于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人们往往把二者混在一起,简单地从教育家的阶级地位“推绎”出其教育思想的“阶级属性”,从而予以绝对的否定。从1980年开始,一些前辈教育史学家率先发表文章,对杜威等人的教育思想进行再认识。赵祥麟教授较早明确提出了要对杜威教育思想进行具体研究,既要看到其思想的阶级实质,又要以发展的眼光分析其中有价值的成分,从而客观评价杜威在教育思想史上的地位。^②此后,陈景磐、王天一等教授先后著文,从杜威的道德教育学说、杜威学说与赫尔巴特理论的比较等角度,广泛、深入地探讨杜威教育思想,以

① 教育史研究会首次年会纪要[J].教育研究,1980(1).

② 参见赵祥麟.重新评价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2).

更加客观、辩证地评价杜威。^①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教育史界出现了一股“杜威热”。

相形之下,对赫尔巴特的重新评价要寂静一些,在广度和深度上都略显逊色。有的研究者力图从教育家所处时代与教育家本人思想二者结合的角度来评价赫尔巴特,^②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较有见地的尝试。

第二,由于一些师范院校教育系(科)的先后恢复或建立,外国教育史在师范院校教育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得到恢复,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开始走上正规化。与此同时,一些省市和高等师范院校相继成立的教育科学研究所也把教育史学科纳入研究范围,设立教育史研究室或组。一些省(如安徽、湖北)还专门成立了省教育史研究会。在全国,则有中国教育学会下属的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协调、组织全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这些机构和组织不仅使教育史研究重新获得学术上的认可,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学术交流与合作、活跃学术风气、丰富思想等方面为教育史研究工作者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在这三年中,由于大量教育刊物和大学学报相继复刊或创刊,为外国教育史研究成果的发表、交流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以说,这一时期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之所以能迅速从废墟中重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述组织、尤其是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的成立。

1978—1982 年间,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虽然主要体现在学科的恢复与重建,但不能把这种恢复和重建简单地理解为对过去的重复,更不能把重建工作片面地理解为一种保守或保存,而应充分认识到其中的奠基意义和革新意义。易言之,这个时期学科重建的基本导向是指向未来,而不是指向过去。从上述两个方面的重建工作的深远影响来看,前者是从内在的方面为学科发展扫平道路,后者则是从外在条件上为学科发展打下基础,没有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就不可能有以后几年的探索与发展。另外,这个时期在扩展学科研究领域问题上,也取得了一些新成就。例如,金锵教授对学科理论建设的探索,^③一些研究者对爱因斯坦、

① 参见陈景磐,《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批判》的补充[J].教育研究,1982(9);王天一,杜威教育思想探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3).

② 肖远,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阶级性格和时代特征[J].教育研究,1982(2).

③ 金锵,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J].教育研究,1980(1).

培根、赫胥黎等人的教育思想的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外国教育史研究此前未曾涉及的。

二、探索时期(1982—1985年)

1982年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以后,外国教育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全面探索的时期。从发展的观点来看,这也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

在前一时期拨乱反正、学科重建的基础上,外国教育史研究工作者转向对学科建设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探索。这种探索可以归纳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二是如何使外国教育史研究为教育的现实发展提供充分、合理的借鉴,从而使学科研究在新时期保证旺盛的活力。这两个方面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对于我国的外国教育史研究工作者来说,前一个方面的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教育界开始系统研究国外教育发展历史以来,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一直未能建立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主要沿袭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模式,之后则搬用苏联的体系。在外国教育史学科尚处于发展初期时,这种状况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和教育的发展,随着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不断发展,上述方式不仅不能适应新的需要,反而起到一种束缚作用。有鉴于此,在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之后,一些教育史研究工作者立即开始深入探讨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中国化的问题,并于1983年9月召开了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史学家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①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见解上,学者们存在着分歧,但是,在很多重大问题上,还是达成了某种共识。例如,扩展外国教育史学科范围,更加深刻、全面地阐述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认真研究教育历史的分期,等等。特别重要的是,学者们一致认为,应摆脱苏联教育史

^① 安徽省教育史研究会.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探讨会论文集(内部交流)[C].

模式的束缚,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使之适应我国社会的新需要。这次会议不仅标志着这个时期外国教育史的探索已经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而且标志着教育史学科研究在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此开始走向成熟和独立的发展道路。

这种高层次探索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一批具有特色的外国教育史教材和著作的先后问世。出版较早、影响较大的是王天一、夏之莲和朱美玉三位教授合著的两卷本《外国教育史》(1984年出版上册,1985年出版下册)。一方面,它的体系初步突破了苏联教育史模式,也摆脱了“欧洲中心说”的影响,所涉及的时间、空间范围都是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它在处理各个时代的比例关系、史料与观点的关系等方面,也颇有特色。正是这些原因,它成为我国使用范围最广的外国教育史教科书。这部著作虽然还不能说已经真正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但却是向着这个目标前进的较早尝试,事实证明,这也是一次较成功的尝试。在这个时期,除了已经正式出版的著作之外,还有大量的著作开始撰写,它预示着一个外国教育史学科中国化的新时期的到来。

在如何使外国教育史研究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合理的借鉴这个问题上,教育史研究工作者同样表现出巨大热情。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教育改革以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工作者一直以高度的敏感关注着改革的进程,并不断从国外教育发展历史中探索和挖掘可以为我所用的经验教训。这方面的论著在外国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上述研究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一方面,研究的领域从普及义务教育、中等教育扩展到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教育立法、教育政策和规划。另一方面,研究的视野更为开阔,研究者逐步摆脱单纯对一国教育进行研究的框框,开始走向跨国比较、多重角度的比较,从而使研究成果更具有科学依据和普遍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有的研究者开始自觉地把新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国外教育的研究中,从而使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方法更加丰富。此外,这个时期的外国教育史研究除了广泛探索发达国家发展教育的经验与教训之外,还开始更多地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变迁,这是一个几乎全新的研究领域。事实上,由于我国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

具有很多相似性乃至相同之处,因而,对这些国家教育发展的深入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更有实际价值。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不能把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史研究简单地理解为学科领域的扩大,在本质上,它体现了我国教育史研究工作者思想认识的日趋成熟和强烈的现实感。

但是,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1982—1985年的探索时期,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虽然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对这项工作的理论基础的探索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可能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例如以观点剪裁史料;把活生生的、丰富多样的教育发展史生硬地套入预设的框架之中;等等。而且,缺乏理论的探索,也易于使借鉴工作或是流于形式或是失之肤浅。另外,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中国化与教育史研究的现实化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现实化正是促进中国化的一种强大动力,反过来说,中国化又可以使现实化获得更深刻和丰富的含义。遗憾的是,在这个时期,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一直是各自独立进行的,因而相互抑制,难以取得更为理想的进展。

概言之,从1982年第二届年会到1985年10月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年会这三年间,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进展虽然以全面探索为主旋律,但是,这是一种前进中、发展中的探索。这种探索本身即是发展,而且是一种导致新发展的“发展源”。

三、发展时期(1985—1990年)

在全面探索的基础上,从第三届年会以后,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进入了全面繁荣和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所出现的发展势头和繁荣局面是前所未有的。

第一,在外国教育史学科中国化方面取得了更广泛的成就。这个时期,先后出版了赵祥麟教授主编的《现代外国教育史》(1987年)、北京教育学院等主持编写的《外国教育史简明教程》等近十种外国教育史教科书。此外,滕大春教授任总主编的多卷本《外国教育通史》《外国教育史》的近代卷和现代卷也相继问世。这些著作虽然各具特点,但基本的倾向是一致的,那就是积极推进外国教育史学